

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名著一本通丛书

徐志摩

散 文 经 典



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名著一本通丛书

徐志摩

散文经典

编选·注释·导读：李忠阳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徐志摩散文经典 / 徐志摩著. -- 南昌 :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, 2011.11

(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名著一本通·第2辑)

ISBN 978-7-5391-6984-2

I . ①徐 … II . ①徐 … III 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现代 IV . ①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18917 号

徐志摩散文经典

李忠阳 / 编选·注释·导读

丛书主编 张秀枫

责任编辑 吴 镛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
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版人 张秋林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2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 22.5

字 数 290 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391-6984-2

定 价 35.00 元

赣版权登字—04—2011—702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-86524997



送
胡
元
志
摩

徐志摩给胡适的签名照。



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。



与张幼仪在欧洲的合影。



张幼仪在巴黎与亲友合影（右起：刘文岛、张幼仪、刘文岛太太、张公权）。



1924年4月12日，63岁的泰戈尔与徐志摩（后排左一）、林徽因（中排左二）等合影。

CONTENTS

目录

- 1 / 导论——徐志摩散文的诗与思
9 / 印度洋上的秋思
17 / 翡冷翠山居闲话
22 / 巴黎的鳞爪
37 / 我所知道的康桥
49 / 天目山中笔记
56 / “浓得化不开”（星加坡）
63 / “浓得化不开”之二（香港）
69 / “死城”（北京的一晚）
78 / 北戴河海滨的幻想
82 / 一封信（给抱怨生活干燥的朋友）
86 / “迎上前去”
92 / 自剖
99 / 再剖
104 / 求医
110 / 想飞
116 / 曼殊斐儿
132 / 泰戈尔
140 / 济慈的夜莺歌
151 / 丹农雪乌
166 / 罗曼罗兰
174 / 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

徐志摩

182 / 白郎宁夫人的情诗

205 / 一个行乞的诗人

218 / “就使打破了头，也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”

221 / 罗素又来说话了

231 / 落 叶

245 / 论自杀

255 / 守旧与“玩”旧

262 / 吸烟与文化（牛津）

267 / 卢梭与幼稚教育

276 / “话”

287 / 海滩上种花

294 / 关于女子（苏州女中讲稿）

308 / 秋

318 / 我的祖母之死

331 / 我的彼得

336 / 吊刘叔和

341 / 伤双栝老人

345 / 家 德

351 / 徐志摩年表（1897—1931）

徐志摩

导 论

——徐志摩散文的诗与思

李忠阳

今夜是谁在扮演你，重复你
在试穿你的衣服，如火中取栗
而心是风中之蕊，迎向寒烟里的晨钟

倘若我们望向精神的空际，寻一片翩翩、自在、轻盈的游云，便看到他；如果我们步入文学的幽林，找一只多情、恩摯、终宵歌吟的杜鹃，便听到他；假使我们探往历史的深谷，觅一只如春光、火焰和热情的黄鹂，便感到他。他耽悦云游，却关切大地的命运；他不乏凄唱，而歌唱本身是热切的；他积极扬厉，但非基于盲目的幻象。他灵魂真纯，不失赤子之心，如林间春水；他思想驳杂，难以一言蔽之，若南山秋色。庄周梦蝶，栩栩然、蘧蘧然，他是；曾皙春游，歌咏自适，他是；华兹华斯隐居湖畔，行吟田园，他是；雪莱伴游西风，那不羁的精灵，他是。阮籍独驾，穷途哭返，而他说：“迎上前去！”子桑抚琴，歌哭时命，而他说：“我们自身就是我们运命的原因。”罗曼·罗兰说：“一种卑琐的物质压在我们的心里，压在我们的头上，叫所有民族与个人失却了自由工作的机会。”而他说：“除非我们自愿让物质的势力整个扑灭我们心灵的发展，那才是生活里最大的悲惨。”泰戈尔说：“即使全世界都认为物质结果是人生的最终目的，印度也不要接受。”而他说：“切近我们中国自身的问题说，就在排斥太平洋那岸过来的主义（工业主义、物质主义、功利主义——编者注），与青年会所代表的道德。”不论生前死后，他被赞颂，被模仿，被误解，被攻击，被低估，而未尝被遗忘。这就是徐志摩。

野马上的唱诗者

作为新月诗派的灵魂，志摩以诗著称，藉诗传世，而其散文亦属佳品，摇曳多态，光华灼灼，丰丽馥郁，颇为可观。诸多文段不啻诗歌，美得出尘，自天上来，仿若玉露琼浆，我们且擎起杯盏：初巡口腹欢愉，再巡灵魂微醺，三巡身心偕忘。梁实秋先生说：“我一向爱志摩的散文。我和叶公超一样，以为志摩的散文在他的诗歌以上。志摩的可爱处，在他的散文里表现最清楚最活动。”杨振声先生亦称：“至于他那‘跑野马’的散文，我老早就认为比他的诗还好。那用字，有多生动活泼！那颜色，真是‘浓得化不开’！那联想的富丽，那生趣的充溢！尤其是他那态度与口吻，够多轻清，多顽皮，多伶俐！而那气力也真足，文章里永看不出倦怠，老那样像夏云的层涌，春泉的潺湲！他的文章的确有他独到的风格，在散文里不能不让他占一席之地。比之于诗，正因为散文没有形式的追求于束缚，所以更容易表现他不羁的天才吧？”此论既肯定了志摩的散文，且对其艺术特征的概括恰切而生动。

志摩 1922 年于文坛初试啼声，至 1931 年殒落尘寰，前后不过十载，而创作颇丰，留下四部诗集：《志摩的诗》、《翡冷翠的一夜》、《猛虎集》、《云游》，四部散文集：《落叶》、《巴黎的鳞爪》、《自剖》、《秋》，一部小说集《轮盘》，一部戏剧《卞昆冈》，以及诸多译作、集外诗文。以诗名世的志摩，不论作散文抑或写小说，无不赋之以“浓得化不开”的诗情。盛瓶虽异，而馨香恒在，秾丽无改，千姿一贯，总教人忘不了是为志摩的篇章。他自称：“我是一只没笼头的野马，我从来不曾站定过。”彼时及后世的论者便爱以“跑野马”形容其自由无羁的文风。我们不妨视之为野马上的唱诗者。知堂先生的涩味与冲和气象是学不来的，而志摩的诗情与野马风气怕也难以仿拟。前者炼的是心境与造诣，后者仗的是天赋与个性。这恐都归于造化的吧。

如上所述，志摩的散文颇具“野马风”，行文如脱缰野马，腾跃恣纵，奔跳自如，灵动无拘，行止由意，往复随心，写得洒然、翩然、飘然，一任思绪飞动、联想迭生、意象沛发。此正是志摩个性之潇洒、创造之活跃与想象之丰沛的体现。且以《印度洋上的秋思》为例，文章里时而是恒河边情醉的男女，时而是纱帐中甜睡的婴儿，时而是河石上独伤的诗人，时而是柴屋里悲泣的少妇，时而是抽烟的矿工，时而是凝定的潭水，时而又

回转于志摩的船上，并藉以引发又一轮遐思，繁縟络绎，绵绵未断，目不暇给。其野马风气，可见一斑。然而这匹“野马”并非无踪可寻、散漫无度、乱纵失序，文章里虽是画面繁复、联想纷呈，但其间却有联络，即一轮清明的秋月。而萦绕秋月者，是志摩的一脉绵绵愁思。

志摩到底是诗人，作文如唱诗，取其两长，异彩各彰，既得了散文形式之自由，也未尝阻遏诗情之涌流；既有散文的平易、晓畅、连贯与完整，亦不乏诗歌的意境、意象、音韵与跳跃。简而言之，志摩的散文是“诗化散文”，颇具形式感，尤为风格化。举其要者，即修辞之繁与音乐之美。志摩的文章，网罗艳华之象，出入虚实之间，读之不能不能感受到他修辞的缛丽。其譬喻丰富，意象层出，联想环生，排比成势，处处珠玑，在在有情。同时，志摩善于协调长短句式，以成节奏的起伏缓急、音韵的悠扬铿锵，求的是音乐之美。试举一段，描写云雀，文出《想飞》：

你能不能把一种急震的乐音想象成一阵光明的细雨，从蓝天里冲着这平铺着青绿的地面不住的下？不，那雨点都是跳舞的小脚，安琪儿的。云雀们也吃过了饭，离开了它们卑微的地巢飞往高处做工去。上帝给它们的工作，替上帝做的工作。瞧着，这儿一只，那边又起了两！一起就冲着天顶飞，小翅膀活动的多快活，圆圆的，不踌躇的飞，——它们就认识青天。一起就开口唱，小嗓子活动的多快活，一颗颗小精圆珠子直往外唾，亮亮的唾，脆脆的唾，——它们赞美的是青天。瞧着，这飞得多高，有豆子大，有芝麻大，黑刺刺的一屑，直顶着无底的天顶细细的摇，——这全看不见了，影子都没了！但这光明的细雨还是不住的下着……

前两个句子之精彩，令人拍案叫绝。层层比喻，相互套嵌，连缀成片，繁密无间，由近而远，打通感官，恣纵想象，又恰切得当，不能不服膺志摩的诗才。所谓“妙喻”，须既“奇”且“通”。初读，耳目一新，颇感陌生；再思，情理俱通，甚觉恰切。这两句话有着水晶般艺术品质，读之仿佛看到水晶结生水晶，生发不已，彼此辉映，无限纯粹。后面关于云雀的飞动与啼啭的叙写，多出之以灵动的短句，既活现云雀的情态，且富于音乐性，节奏轻快活泼，宛如云雀之乐音。徐文之诗化，由此可见。志摩的文章富

于变化，此处恐难详尽，只得见诸具体篇章的赏析了。

被低估的现代性批判者

志摩的思想、主张和关切，在散文里表达得最为清楚。而每篇内容到底不同，或云游异国，或深自省察，或审视社会，或悼念逝者，所感各异，所思有别，此处取其荦荦大端者，或谓一以贯之者，亦是最富启示者。同时，笔者拟为志摩的思想略作重估，稍作辩护，旨在反思当下。对于读者而言，或可视之为阅读的意义所在。

20世纪90年代以降，大众媒体所书写的志摩形象，大抵是一位风度翩翩的贵族公子哥，是情圣、情痴的代表，故其所演绎的故事无出于才子佳人、风月韵事的范围。比之于上世纪50—70年代对志摩的政治大批判和全盘否定，大众文化虽是给他“黄袍加身”，但同样是“不及其余”式的理解，是一种遮蔽、误解与低估。至若今日学界，其对志摩思想的梳理及概括，大体全面，相对客观。但在价值、意义的评估上，其或不置一词，或罔顾其最深刻的洞见。而这殊非意外，是今人对现代性的迷信使之然。志摩彼时不合时宜，今日亦然，一如他的自嘲：“我的信仰，我也不怕陶先生（陶孟和——编者注）与读者们笑话，我自认永远在虚无缥缈间。”倘若没有对人性、生命、人生与世界更为广阔的理解，是难以理解一位诗人之意义的，因为他所呼唤的正是这份“广阔”，而非一点罗曼蒂克的幻想。

胡适先生对志摩有一段评语，已成后世不易之论，即“他的人生观里真是有一种‘单纯的信仰’，这里面有三个大字：一个是爱，一个是自由，一个是美。他梦想这三个理想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，这是他的‘单纯信仰’。他一生的历史，只是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。”此言大体不错，而容易引入误解之处，即许多人将志摩的“单纯信仰”狭隘地理解为是他个人的实现，而无视他对社会的关切。除却上述“爱、自由、美”的单纯信仰，志摩也是一个情感的信仰者、生命的信仰者、自然的信仰者。而这些亦可统一于他的单纯信仰。这份信仰，绝非囿于他个人之美好生活的意义，更是他对生活共同体的关切，是对整个现代生活的重新构想。在精美的语言器皿里，志摩投入了对现代生命深情眷注的目光，盛放了对社会的忧思与性灵的补剂。人，尤其置身于现代处境者，应当如何生活？这

是他所追问、所关怀、所思考并不断作答的根本问题。或许他的思考不系统，或许他的观察亦有偏颇，或许他的回答无甚创见，但并非不深刻，并非没有启示，并非大流之论。我们该摒除既往对他的固定印象与图式，重新倾听他的声音。

志摩对现代文明的批判是激烈的，其观点今天读来仍不失振聋发聩之效，且愈发见其深刻性。他自然不是守旧派，却也不迷信现代。他曾说：“归根的说，现有的工业主义、机械主义、竞争制度，与这些现象所造成的迷信心理与习惯，都是我们理想社会的仇敌，合理的人生的障碍。现在，就中国说，唯一的希望，就在领袖社会的人，早早的觉悟，利用他们表率的地位，排斥外来的引诱，转变自杀的方向，否则前途只是黑暗与陷阱”（《罗素又来说话了》）。他还说：“在我们一班信仰（你说可以叫迷信）精神生命的痴人，在我们还有寸土可守的日子，决不能让实利主义的重量完全压倒人的性灵的表现，更不能容忍某时代迷信（在中世是宗教，现代是科学）的黑影完全淹没了宇宙间不变的价值”（《论自杀》）。在志摩看来，“现代的文明只是骇人的浪费，贪淫与残暴，自私与自大，相猜与相忌，颶风似的倾覆了人道的平衡，产生了巨大的毁灭”（《泰戈尔》）。他认为，科学破除宗教迷信，而自身成为现代迷信；而现代文明本身，也是一种野蛮，如他说：“那时候的人（对现代文明沾染较浅的人——编者注），我猜想，也一定比较的不野蛮，近人情，爱自然，所以白天里听得着满天的云雀，夜里听得着夜莺的妙乐”（《济慈的夜莺歌》）。而这正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现代的看法：“人类没有进入真正的人性，反而深深地陷入野蛮状态。”他们在《启蒙辩证法》一书中认为，启蒙使人类依靠理性与科学而从神话世界中解放出来，而其自身成为新的神话，带来了新的蒙昧。“一个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。”可以说，志摩的观点对于彼时和今日狂热追求现代性的中国而言，都显得不合时宜。然而我们只消看一看现代性所带来的危机，如最为直观的生态危机，便会觉得他的话也并非是无的放矢。

对现代性做出批判，或许如今看来不算新鲜，诸多知识分子致力于此业。而志摩的启示性何在呢？难道仅仅是因为他把这些观点表达得娓娓动听吗？笔者以为，志摩的洞见与启示在于：现代文明的病因在人自身，在人心。他说：“如其一时期的问题，可以综合成一个，现代的问题，就只是‘怎样做一个人？’”难道生态危机不是缘于人类的贪婪吗？所以他始终呼

唤着心灵的真纯，表彰着伟大的人格，如《泰戈尔》、《罗曼罗兰》等篇章。他的文字是人性高贵的表达，是赤子之心的跃动，是告诉我们学会面向伟大，将心灵敞开向丰饶。我们大概习惯了“欲望叙事”所表达的当代人性，习惯了由资本逻辑所界定的“现实”，也见惯了媒体所追捧的商业成功者。而志摩告诉我们，不必理会美国十大富豪，该去倾听托尔斯泰与甘地的真谛。

志摩对现代性的批判，是一种审美的批判，道德的批判，伦理的批判。“精神的生命”，是他的出发点和归宿地。张汝伦先生在《如果泰戈尔今天来华》一文中指出：

最近几十年，对西方种种制度（machinery）的迷信，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，社会科学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占有压倒的优势就是一个明证。人们不但不反对现代的物质主义，更不反对这种物质主义在思想文化上的表现，这就是社会科学帝国主义。人们总是停留在物质制度层面谈问题，几乎没有再关心人的精神了，更没有人会从人的精神和灵魂出发来谈问题，十几年前人们对人文精神讨论的反应，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。人们认为当务之急是制度，而不是人心，人心早已不在我们的思想家考虑的范围之内……我们不能不承认今天世界上的种种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，世界的危机归根结底是人的危机。近代以来，人们陷入的最深的迷信是制度迷信，以为有某种制度可以包治百病，不但能使民富国强，也能使魔鬼变成善人。这种迷信是启蒙对工具理性迷信的一个变种。

面对现代的问题，与泰戈尔的着眼点庶几近之，徐志摩正是从人心、精神和灵魂的角度来谈，从人自身来谈，所以他才说：“我们本身就是我们运命的原因”（《落叶》）。学人李慧超指出：“我们不仅缺乏对自我的思考，也缺乏这种思考的意识，所以无论是什么时候，我们都会习惯性的找‘自我’以外的原因，比如制度。”我们在探索制度的同时，或许也该思志摩所思、问志摩所问：怎样做一个人？这或是问题的肯綮所在，也是最可珍贵的启示。

志摩对现代世界的期望，是一个有情的世界。他希望以“感情”来重构现代人之间的关系。他者对于我而言，并非一个契约主体，且彼此关系

并非被现代权利观念和资本逻辑所宰摄。在志摩看来，“真的感情，真的人情，是难能可贵的，那是社会组织的基本成分”（《落叶》）。人在社会中是孤立的个体，而感情则如同线索和经纬，将人与人联系在一起，形成和谐的整体与统一的力量。他认为，社会的危机是感情的危机。现代社会的根本病症不在于政治经济制度，而是真的感情的丧失，是人心的堕落。

大抵或有人讥嘲志摩天真、虚妄，将其想法归于一个诗人的浪漫幻想。首先，这类人貌似精明而成熟，实则视野狭隘而浅近，目光为现代性原则所蔽，缺乏对生命、生活的广阔理解，失去对个人存在和人类历史的新的想象。我们为什么单单迷信制度，而不着眼于感情？我们为什么独独信赖物质，而不尊重精神？我们应该有不同的思考，不同的构想，不同的追求，为了一个不同于今日的美好而良善的未来。“人类对世界、对自己可以有一个更为自由和广阔的理解。只有这种理解，才能把人类从现代性中拯救出来”（张汝伦语）。

此外，笔者不认为志摩的思想是完全脱离传统和本土的，并非某些论者所言：“当徐志摩全身心地融入到剑桥式的西方文化体系中去时，他却没有很好地把它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。”首先，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。中国人“从中国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，而以伦理组织社会，消融了个体与团体两端”（梁漱溟：《中国文化要义》）。人与人之间所重者，是情与义。“在中国社会处处见相与之情者，而西洋社会却处处见出人与人相对之势。”（同上）志摩提出“感情”是社会组织的基本成分，期望以修复感情来修复现代社会，正合贵人情、重乡情的传统国情。而他所谓“感情”，是“友爱与同情”，融入了“平等”的现代精神。其次，志摩贵自然，强调在自然中求得性灵自由、身心和谐，这固然可说是受英国湖畔诗人的自然主义的影响，却也未始不见庄周的影子。

人云志摩西化尤甚，是个人主义者，亦言之有据。然而，我们莫忽视志摩身上的古典气质或“反现代”特征。在诸多篇章里，志摩未尝言理性与权利，说的是性灵与感情；所重并非科学，热爱的是自然；瞩目的不是独立个体，关注的是人伦关系。这也是确凿有据的，见诸《落叶》《秋》《罗素又来说话了》《泰戈尔》等文。倘若我们的世界精神颓败、感情贫乏、性灵窒碍、自然毁坏，那么权利、民主、科学等又有何存在的意义呢？

胡适说：“他（徐志摩——编者注）的失败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的

失败。他的追求，使我们惭愧，因为我们的信心太小了，从不敢梦想他的梦想。”或许徐志摩正如堂·吉诃德，屡屡碰壁，总在失败，时被讥讪，更被风车打翻在地。然而这位愁容骑士到底走了多远，经历了怎样的丰富，见到了怎样的世界，实现了怎样的奇迹，是他的乡人们永远不知道的。口言历史、现代、人类等，太过宏大，且从自身说起：对人生自由而广阔的理解，对生命的另一重想象，对心灵图景的拓展，对人性高贵的向往，对美的深切感受，或可成为我们阅读志摩的起点和终点。志摩的文字，是我们心灵的诗意的栖居之所。

就是这样。